

# 横线与纵线交织，才是全景的世界史

——访《全景世界史》主编、东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羽田正教授

本报记者 朱自奋

“我想将某一时期的世界的断面图描述出来。”东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历史学家羽田正教授在一次谈话中说，而日本大月书店的编辑岩下先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句话，他想的是“若是能将世界历史用一张图画来解说……”羽田正认为岩下先生的这个提议非常有意思，于是，一套面向日本青少年而编写的《全景世界史》就这么开工了。该书在日本出版后，受到诸多好评，并推出了文库本。最近，复旦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中文版。

在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志达书店共同举办的《全景世界史》中文版读者交流会上，羽田正教授、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和该书中文译者张厚泉教授就此书的出版、特色与读者作了分享，现场气氛活跃，尤其是中国小读者们的踊跃提问，令羽田先生感慨“中国孩子真厉害”。在张厚泉教授的帮助下，记者采访了羽田正教授。

“在现代世界里，有意识地将世界全体纳入视野进行思考，并通过判断付诸行动，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需要具备‘地球居民’的意识，才能让孩子们将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学会与世界上其他人民互动与合作。”羽田正教授谈及主编《全景世界史》的初衷。

“《全景世界史》是一部采用新的世界史眼光来写的世界史著



羽田正

《全景世界史》  
[日]羽田正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之前在日本并没有同类著作。”羽田正说。在他的获奖学术著作《东印度公司和亚洲的海洋》以及最新专著《全球化与世界史》中，羽田正阐述了他的“全景世界史”观点。与最初由西方史学家提出的“全球史观”不同的是，羽田先生的亚洲学者身份，以及他初始于伊斯兰史研究的学术研究背景，使得他的“全球史观”相比于西方学者的相关著述，更具有“去西方中心化”的自觉意识，强调不按国民国家、欧洲、亚洲等通常的撰写格局来写世界史。

“国民国家、亚洲、欧洲等，虽然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类观察世界时采用的格局，但并不是所有的时代、地域都有效，现代世界尤其如此。有什么必要将世界划分为亚洲和欧洲呢？我们有必要跳出这种框架，用崭新的眼光去审

视世界的历史。亚洲与欧洲并非是一直对立的。就亚洲人自身而言，直到19世纪后半叶，还没有‘亚洲’的自觉意识。另外，‘欧洲’一词在叙述世界史格局时也并非一定有效，虽然欧洲提倡全球史的学者对‘欧洲’一词并不存异议，而是如同空气般理所当然地使用着这个词。我的主张是首先应从重审‘欧洲’这一概念开始做起。”

“当我们观察人类历史时，到目前为止的很多历史著作都是按照通史、各国的国别史等框架来写的。”羽田正把这种通史所展现出来的历史面貌称为历史的“纵线”，即从古到今的一个叙述纵线。但历史还需有所谓的横截面才更完整，“历史的横截面，即所谓的‘横线’，也就是在某一个特定时间里，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同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羽田正认

为，只有当“纵线”和“横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更清晰、更详细的认识。

这套《全景世界史》正是基于这一世界史观的实践，这也是这套书区别于市场同类其他世界史著述的最重要特征。“关于纵向的历史，现在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横截面的研究并不多。就像织一块布一样，有竖线，有横线，才能织出一块很漂亮的布。而更重要的是，有时候当横的线插入的时候，竖的线就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反之亦然。只有这样的互相调整，从两个角度观察，才能理出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

从横截面的角度来看世界历史，把同时段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放在一起，往往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所谓东山钟响，西山听音，重大历史事件之间，互相会有呼应，会有远距离时空的后续影响，对此，这套全景世界史可谓找到了一个很适切的展现方法。比如公元750年，也就是安史之乱之前五年，那时的唐朝还很发达，从这一页横切的世界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阿拉伯人——伊斯兰教的大食帝国发生了一场战争，地点在现在的吉尔吉斯坦，中国人战败，好多工匠被俘虏到撒马尔罕和更远的地方。而正是这场战争，使得中国人从此把造纸、养蚕、缫丝的技术传到了西方。而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方，如罗马

帝国、日本等，亦处在文化变革中。该书就用这种思路，“把世界像一张图一样摊开来”，把整个世界的即时互动全景地呈现了出来。

羽田正教授坦言，撰述“横向世界史”的难度之大，超出了他当初的想象。“考察某个时期的世界时，如何说明其全体的特征？特别是前近代，迄今为止，史学界没有有意识地考虑过。另外，若找到某种特征，选择什么样的话题把它表达出来，也是难题。没有参考先例，只有和执笔者们不断地学习、讨论，只有向前迈进，没有退路，有点像驾驶一艘没有海图的大船在海洋上航行。”

除了对全球史采取“经纬纵横”的著述思路之外，这套《全景世界史》另一个学术上的重要特点，即十分注重表现民众的生活。“很多历史书都把叙述重点放在著名政治家或伟人身上。其实历史不单单是这些名人创造的，同时也是底层的广大普通百姓创造的。”羽田正说。所以该书有很多贴近百姓生活的叙述内容。比如该书花了两页的篇幅，专门介绍猫的历史，甚至书中还专门介绍了芭比娃娃、足球、西装等历史。在书中精心制作的插画部分，羽田和他的团队极为注重插画对历史人物生活面貌的还原，对服饰、发型等细节均作了专业把关。

对该书中文版的面世，羽田正教授表示非常期待：“在考察世界史时，中国是无法忽略的要素之一。本书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基本上所有的时代都包含了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的解说。如果该书能成为中国年轻人思考‘世界中的中国的位置’的契机的话，我将非常高兴。”

(上接第一版)考虑到赵昌平的请求和社的实际情况，局领导让我当年10月回社工作，社里安排我承接了昌平分管的大部分工作，除分管文学编辑室等编辑室外，还分管编审室、美编室和校对科。我又在昌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他曾经对我说：“你和我都是做学问的人，别走仕途了，就跟着我干吧。”在他的指导下，除了继续维护好《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等一批品牌图书外，我又策划出版了《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等一批有影响的图书，与中华书局联合出版了《文史中国》丛书等。后来，我又兼副社长，分管社出版、发行工作，协助王兴康社长负责社经营工作。在王兴康的主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前辈打下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克服困难的办法，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终于走出了经济状况低迷的局面，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赵昌平作为社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在负责编辑工作的同时，主动承担了社里许多繁重的事务，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9年12月，世纪出版集团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调我到处于经济困难状态的上海远东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兴康和昌平对我的调离都很伤感。昌平对我说：“你一走，我以后策划的书让谁做啊！”他还临别赠言，说：“你有童心而无机心。有童心能够赢得朋友，而无机心处世难免要吃亏。”昌平的话让我很感动。在远东社员工的共同奋斗下，经过三年的努力，远东社扭亏为盈，走出了低谷。昌平闻讯也为我高兴。

2013年1月，集团让我回上海古籍出

版社接任社长，昌平对我的回来很高兴，说本来担心接棒的人是否熟悉业务，这下放心了，表示坚决支持我的工作。他还提议由他和我与傅璇琮、刘石先生共同出任我社将要编辑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主编。不久，他就办了退休手续，由社返聘，继续担任社《中华文史论丛》的执行编委，直至2015年年底他满70岁止。那些年，他还担任上海出版协会理事长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职，参加和组织各类学术活动，参与制订《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为提高上海出版人的专业素质，为扩大上海出版在全国的影响力，为我国的古籍整理事业，殚精竭虑，不辞辛劳，作出了重大贡献。

## 一个有思想的出版人

去年8月，与他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夫人因病突然去世，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长时间沉浸在悲痛中几不能自拔。为了让他走出来，我坚邀他年底来社参加《中华文史论丛》编委会，与学界老友见面。他如约而来，并对如何继续办好《中华文史论丛》提出建议。会后，他坚持不吃便饭，说是给自己一个约定，在妻子悼亡的一年内不在外面吃饭，仍然要回家与亡妻一起吃饭。昌平先生对夫人的深情真使我们为之动容。

与昌平相识相知30多年，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有三：一是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二是他对古籍出版的清晰认识，三是他为人处世的厚道大气。

昌平读大学期间曾师从林庚先生等

名师，读研究生后又师从施蛰存、马茂元先生等大家，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在出版社又与陈振鹏、李学颖等古籍整理名家为伍，在长期的专业工作中沉潜往复，好学深思，眼界更为扩大。他在唐诗学、中国诗学、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为学界所公认，2000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近几年，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的学术文本撰写上，深入探寻中华文明的发生与传播，视野更为宏通。

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出版人，昌平有着现代宏观的出版视野和清晰的出版理念，认为“寻找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必由的当代进路与古籍出版的考虑基点，在继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传统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四个意识——市场意识、专业意识、品牌意识、规模意识”以及“高品位、系列化、普及读物要精品化”等一系列有创意的出版理念。他在《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丛书的《编者的话》中这样写道：

这套丛书继承发扬了上海古籍出版社46年来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也集结了多方面的正反经验：名家操作，深入浅出，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更是她新的关注。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述；反俗为雅，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是其标格所在。

他还写道：

尽管当代域外文化纷至沓来，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必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方能落地生根；中国文化的的世界性，必将由她的民族性来体现。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也因此，科技知识与人文关怀并重，必然与中西文化的融通互为条件。

他在《文史中国》丛书的《出版缘起》中也写道：

有别于以往的传统文化读物，《文史中国》的宗旨可概括为一句话：题材是传统的，眼界是当代的。因此除了科学性与可读性相统一的常规标准外，丛书从选题到撰写，更要求以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视域来透析中华文化的深刻意蕴。而“中华”与“上古”深厚的学术底气与近十年来的创新精神，正是践行这一宗旨的可靠保证。

有了清晰的理念，他以前瞻性的眼光，深厚的学术积累，策划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很高学术质量和很大影响力的图书，至今仍为读者所欢迎。

昌平为人厚道，处世大气。他特别喜欢与社里的年轻人文朋友，认为社的希望在他们身上。记得他任总编辑后，专门让社里给他订一份《青年报》，以了解青年的诉求。他尤其关心青年编辑的成长，对他们着力培养，大胆启用，言传身教，为他们早日成才创造各种条件。正是有了像昌平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社领导的垂范，上海古籍出版社才一直以有一支能薪火相传的出版人队伍而自豪。

30多年的交往不是一文能说尽的。纸短情长。谨以此缅怀赵昌平先生。

2018年5月24日